

三线建设片论

□ 周云 刘少萍

20世纪60年代中期，毛泽东、中共中央从建设国家国防后方的战略构想出发，决定开展三线建设。所谓三线，是一个国防概念，当时中共中央从国防布局的出发，把全国分为一、二、三线，一线指沿海和边疆地区，是国防前沿地带；三线，当时划定范围，是甘肃省乌鞘岭以东、山西省雁门关以南、京广铁路以西和广东省韶关以北的广大地区，包括四川、贵州、云南、陕西、甘肃、青海、宁夏、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山西的西部、广东的北部、广西的西北部，共计13个省、自治区的全部和部分地区。这一地区位于我国腹心地带，具有进行大规模三线建设、建成巩固的国防后方的一些基本条件；二线是指介于一线和三线的地区。三线建设决策始于1964年，1965年全面开始建设，直至1980年。1980年后，三线建设进入调整改造阶段，1990年代初期陆续收尾并基本完成。但直至2006年，调整改造工作才彻底结束。

本文主要讲述1964至1980年三线建设的历史。由于学界对于三线研究的成果已然较多，本文篇幅有限，不就三线建设进行全面论述，而是选择三线建设比较重要的以及与广东关系密切的内容予以论述。

A9

壹 三线建设开展的背景与决策

新中国成立不久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，加上朝鲜战争爆发，新中国一直面临着严峻的国防形势，因此国防支出费用浩大，这对于经济社会建设造成了巨大压力，因此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开始思考进行改变。1956年，毛泽东在著名的《论十大关系》中提出，“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，增加经济建设费用。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，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”。在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上，他也指出要充分利用沿海工业良好的基础，他说，“最近几年，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，对它的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。这要改变一下”。因此，“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，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，并且利于备战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，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。”“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，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。”到1964年，中央开始部署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，其指导思想把重点放在“抓吃穿用”。但也正是这一年，毛泽东、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的指导思想发生了较大的转变，国防建设被放在一个更为重要的位置。

究其原因，还在于我国面临的国防形势变得更加严峻，国防后方建设变得愈加紧迫。当时，我国周边地区极不宁静，进入1960年代后，越南局势逐步升级，直至美军直接介入。印度在中印边境屡次挑衅，我国忍无可忍，发起自卫反击战。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，苏联在我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。台湾地区的蒋介石集团也蠢蠢欲动，叫嚣“反攻大陆”。这些都对我国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。

更有甚者，美方方面，已经密谋对中国进行直接打击。据陈东林先生根据美国揭秘档案的研究，肯尼迪在位期间，美国高层一度酝酿对中国核设施进行打击，并紧锣密鼓地制定了相关计划。

打击的主要办法包括：飞机轰炸，飞机空降破坏小组引爆，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，乃至有选择性地使用核武器打击等。肯尼迪本人倾向于支持对中国进行打击，并秘密同苏联方面联系，试图获得苏方的支持或者合作，但遭到苏方的拒绝（1965年，苏方把这一情况反馈给了中国）。同样据陈东林先生研究，在此之前，中共中央已经通过某些渠道，知悉了美方的打击计划。

正是在此如此严峻的国防形势之下，毛泽东、中共中央关于国家建设的思考更多地考虑国防因素，更多地考虑战备。毛泽东的思考，更多地

聚焦在建设国防后方问题上，1964年5月，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，“第一线是沿海，包钢到兰州这一条线是第二线，西南是第三线。攀枝花铁矿下决心要搞，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。在原子弹时期，没有后方不行的。要准备上山，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。北京出了问题，只要有攀枝花就解决问题了。北京淹了，还有攀枝花嘛。应该把攀枝花和联系到攀枝花的交通、煤、电的建设搞起来。”明确地提出了三线建设的构想。对于建设国防后方的思考，毛泽东明显是借鉴了历史教训。他曾说：“要研究斯大林的经验。斯大林一不做工事，二不搬厂，三不准备打游击战，只是仓促撤退。要研究蒋介石的经验，他没有搬，搬得很少。他是靠外国生活的，靠我们在敌后牵制住敌人，才保住重庆。”也就是说，毛泽东认为，无论是斯大林还是蒋介石，都没有建设牢固的国防后方，所以战争开始后，前线地区不仅军事上败退，国防工业也受到严重摧残，非常被动。联系到现实，如果帝国主义侵略我国，占领东部地区，摧毁了东部地区的工业，我们在国防后方建设有完备的国防工业和其他工业交通设施，就有韧性，有后劲，有转圜的余地，有反攻的力量。

毛泽东提出三线建设的构想后，刘少奇、周恩来、邓小平等人纷纷发表谈话，具体部署三线建设事宜。当时正在编制的“三五”计划指导思想由原先的“抓吃穿用”开始转变为立足于战争，从准备大打、早打出发，积极备战，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，加快三线建设，逐步改变工业布局。三线建设随即开始。

贰 广东与小三线建设决策

三线建设又分为大三线和小三线，大三线建设就是上节所述之三线建设，即建设国家层面的国防后方。在大三线建设战略制定的同时，毛泽东又提出，要建设各省各自的国防后方，此即小三线建设。1964年6月8日，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：“假使敌人占领我们的地方，怎么办？沿海各省要搞些手榴弹、炸药厂、军工厂，讲了几年了，都没有搞起来，打起仗来，不能等二、三线给运去。每个省都要有一、二、三线嘛！”这是毛泽东最早关于小三线建设的提议，紧接着，6月18日，他又再次强调这个问题：“地方党委要搞军事。由大区领导，各省要作个计划，包括民兵、军工厂、修理厂。省委第一书记都是政治委员嘛，不行使职务。你们可以作顾问。多少年来，政治委员是空头政委。太平世界了，不搞军事了！一旦发生战争，就会手忙

脚乱。”

而广东省在小三线建设从构想到决策过程中起了特殊的作用。在毛泽东提出小三线建设的想法不久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提出，广东作为一线地区也可以在省内开展后方基地建设（这就是后来的小三线建设），并作了指示：一方面立即专门组织人员进行深入调研，并作实地勘察之后，组织有关专家和工业部门的负责人反复论证；另一方面要求各地区行政公署、专署和自治州计委，提出1965年后方基地建设的意见，并于1964年8月15日前报到省计委。在这个基础上，1964年10月18日，广东省委向中央和中南局呈送《关于国防工业和三线备战工作的请示报告》，对广东的地方三线建设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部署，对如何建立起地方军事工业及其配套工业、交通、通讯设施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规划。

报告以建设地方军工企业为重点，计划在短时间内，在粤北山区腹地建立6家军工企业，主要以生产56式半自动步枪、子弹、手榴弹、地雷和炸药为主；同时，计划在海南建设以生产地雷、手榴弹、合成氨为主的3家军工厂；其余各专区，各建以生产子弹、地雷、手榴弹为主的3家军工厂和1家军械修配厂。考虑到到军工企业配备必要的原料、燃料，建立起平战结合的生产体系，计划搬迁8家民用工业到粤北地区，搬迁1家小电厂到海南后方。

广东第一时间响应毛泽东关于各省三线建设的思考，绝非偶然。这与广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特殊的国防地位密切相关。广东有着全长2500公里的海岸线和星罗棋布的沿海岛屿，粤东地区临近台湾，珠三角地区毗邻港澳，因此成为“国防的最前线”。国防最前线的地位，使得国防工作在广东各项工作处于突出地位，甚至对广东的经济社会规划发展都产生了影响。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，广东没有成为工业基地，被定位为农业省，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出于国防安全的考虑。1953年10月，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陶铸指出，广东省要以最大力量做好农村工作，配合国家工业建设，“华南为国防前线，暂时不易配置重要的工业”。时任广州市市长朱光也指出：“广州是国防前线的沿海城市，它不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点。”广东在毛泽东提出小三线建设的构思后不久，就能够率先在全国提出小三线建设的完备计划，与广东国防前线的特殊地位、广东对国防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密不可分的。

毛泽东看到这一报告后，非常认可，在写给刘少奇、周恩来等人的批示中说：“广东省是动起来了，请总理约瑞卿谈一下，或者周、罗和邓、彭一起谈一下，是否可以将此报告转发第一线和第二线各省，叫他们也讨论一下自己的第三线问题，并向中央提出一个合乎他们具体情况的报告。除非是增加一批建设费，全国大约需15亿左右，分两三年支付，可以解决一个长远的战略性大问题。现在不为，后悔无及。”随后，根据毛泽东的意见，周恩来、罗瑞卿拟定了《关于各省、市、区关于建设自己后方和备战工作的报告》呈送毛泽东和中央，对在全国开展小三线建设进行了详尽的规划与指示。11月3日，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一报告，同时将广东省的报告以及毛泽东的批示向全国转发，要求各地尽快执行。由此，小三线建设正式开启。

可以看出，在小三线建设的决策过程中，广东省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，积极回应了毛泽东的构想，并制定了具体的行动方案，这对于小三线建设从构想到决策起了关键的推动作用。同时，中共中央将广东省的报告转发到全国，也意味着广东省的计划，在全国小三线建设中，起到了示范作用。

叁 三线建设的概况与意义

三线建设分为两个阶段。第一阶段为1964—1970年，投资560多亿元，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的48.5%。这一阶段以1964—1966年为第一个高潮，以大西南为重点，据不完全统计，在西南、西北三线地区安排了300多个大中型项目。1969—1970年为第二个高潮，1969年中苏珍宝岛冲突后，以豫西、鄂西、湘西为重点的中南三线建设迅速展开。三线建设的多数项目于此时期投产或大体建成。第二阶段为1971—1980年，投资1492亿元，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的36.4%。1973年，国家计委实施“四三方案”，其中一些大型化工企业如四川维尼纶厂等落户在三线地区。到1980年底，三线建设基本结束。

三线建设长达16年、横贯三个五年计划，国家在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和自治区投入了2052.68亿元巨资（占同期全国基建总投资的39.01%）；几百万工人、干部、知识分子、解放军官兵和上千万人次民工建设者，在祖国大西南、大西北十几年的巨大付出，修建了10条铁路干线、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、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，其中一些单位成为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柱。

三线建设对我国国防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深远的意义。三线建设围绕和服务国防，开展了国防科技工业、交通邮电、能源工业、原材料工业、机械工业、轻纺工业，建成了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，增强了国防实力。经过16年的建设，三线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初步建立，形成了常规兵器、船舶柴油机、军用飞机、通讯导航、洲际导弹、卫星发射、战略核武器、核潜艇等24个重点研发基地，如酒泉导弹基地、西昌航天发射基地、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、豫西、鄂西、湘西兵器工业基地等，显著增强了国防实力，也确保了我国的国家安全和大国地位。1991年4月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两次发表讲话，高度肯定了三线建设的意义：现在看来，毛主席确定的三线建设方针是正确的……从海湾战争看，洞子很重要，已经到洞子里去的，洞子又没有什么问题，就要用好。同月，在另一个场合，江泽民也指出：“广州是国防前线的沿海城市，它不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点。”广东在毛泽东提出小三线建设的构思后不久，就能够率先在全国提出小三线建设的完备计划，与广东国防前线的特殊地位、广东对国防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密不可分的。

毛泽东看到这一报告后，非常认可，在写给刘少奇、周恩来等人的批示中说：“广东省是动起来了，请总理约瑞卿谈一下，或者周、罗和邓、彭一起谈一下，是否可以将此报告转发第一线和第二线各省，叫他们也讨论一下自己的第三线问题，并向中央提出一个合乎他们具体情况的报告。除非是增加一批建设费，全国大约需15亿左右，分两三年支付，可以解决一个长远的战略性大问题。现在不为，后悔无及。”随后，根据毛泽东的意见，周恩来、罗瑞卿拟定了《关于各省、市、区关于建设自己后方和备战工作的报告》呈送毛泽东和中央，对在全国开展小三线建设进行了详尽的规划与指示。11月3日，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一报告，同时将广东省的报告以及毛泽东的批示向全国转发，要求各地尽快执行。由此，小三线建设正式开启。

可以看出，在小三线建设的决策过程中，广东省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，积极回应了毛泽东的构想，并制定了具体的行动方案，这对于小三线建设从构想到决策起了关键的推动作用。同时，中共中央将广东省的报告转发到全国，也意味着广东省的计划，在全国小三线建设中，起到了示范作用。

今天的见闻，今天广州市内的职业学校仍开设有粤剧、广绣、玉雕、木雕等相关专业，正是因为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，包括牙雕在内的非遗才得以传承和弘扬。

民国报刊中关于牙雕的报道丰富多彩，无论是生活妙招、仿制手法还是物价放大镜，都反映出象牙雕刻及其制品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，百余年来以象牙球技艺蜚声中外的广州牙雕也足以令我们自豪。尽管今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已很难接触到象牙雕刻制品，但还是不应该遗忘历史上象牙雕刻这门古老而精美绝伦的非遗瑰宝。当前，广州市文化馆正在展出的“仙工神品——广州象牙雕刻展”，是2017年我国全面禁止象牙制品贸易以来举办的规模最大的牙雕专题特展，欢迎感兴趣的读者前来参观，共同品味广州牙雕的独特魅力。

（作者是文学博士，任职广州市文化馆非遗保护部）

行或者骑自行车去113厂澡堂洗澡，是本人童年记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从社会风尚来看，113厂和机修厂显然引领了陕西的服装时尚，进入1980年代后更是如此。从体育运动来看，三线企业极大地提升当地的体育竞技水平。笔者青少年时期，多次与三线厂职工或子弟进行足球比赛，切身体会到对手的水平在地方上是高一档的存在，我们20岁左右的小伙子跟对方40多岁的大叔（大多数1970年左右来自沈阳）踢比赛，仍然讨不到半点便宜。但在交流中，我们的水平也得以慢慢提高。

2023年7月，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时也提出，“新时期、新时代还是有一个大后方的概念的”，意味深长，是对三线建设的国防意义和经济意义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高度肯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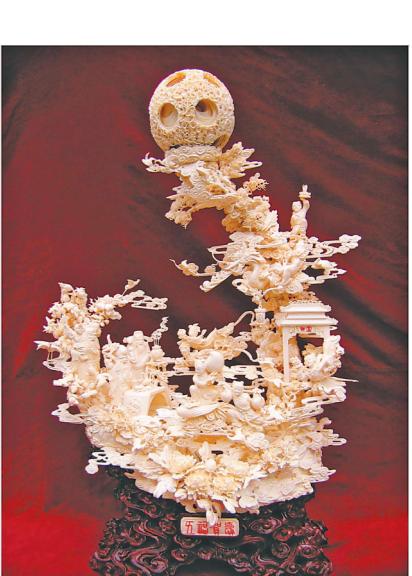
肆

三线建设者与三线精神

三线建设的历史，是一部三线建设者无私奉献的历史。在三线建设者中，有两句话流传甚广，即“好人好马上三线”和“献了青春献终身，献了终身献子孙”。在东部地区抽调援建三线的职工，大多数都是原企业的优秀骨干。出于保密和隐蔽的需要，三线企业的选址严格遵守“靠山、分散、隐蔽”的方针，大多建于地形复杂的山区，把厂址设在杳无人烟的地方，条件十分艰苦，基础设施严重缺乏，在这样极为艰苦的环境下，近乎于从零开始创业。三线建设者大部分来自条件比较好的东部地区或大中城市，他们中有相当多的人都是主动请缨，据一位从上海援建贵州遵义的三线建设者回忆：“当时什么设备都没有，什么东西都没有……那个时候我们就住在老乡的草棚里面，一个大的草棚，几十个人住在一起，隔成一间间的，在那边的条件很艰苦的。开始工作，开始拉电线什么的，一点点东酉拉进去，什么东西都是从上海运过去的，因为遵义基础太差了，工业挺落后的，厂也很少，没什么工业生产……螺丝钉厂都没有，连小螺丝钉都要从上海送过去。真的很落后！我们的生活用品像肥皂、草纸都要自己带过去……肉啊、鱼啊也没有，天天吃大白菜。”然而“三线人”不惧于此，从无到有，在三线地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建设工作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，为我国的国防建设开辟出了战略后方，巩固了国防安全。相当多的三线建设者都是数代人在三线建设中奉献，“献了青春献终身，献了终身献子孙”。正如一位从三线子弟成长为三线建设者的亲历者所说：“三线人一路走来，最初在‘备战备荒为人民’‘好人好马上三线’的时代号召下，我们的父母放弃安逸、舒适的生活，远离海滨城市大连和家人，打起背包，跋山涉水，带领子女移民来到祖国大西南，战天斗地，艰苦创业，无私奉献，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三线建设……50年来，三线人践行了扎根三线、无私奉献的三线军工精神。”

今天，我们回顾三线的历史，了解三线建设的伟大成就，更要明白，三线建设者、三线人是不应该被忘记的。任何伟大的成就，都是平凡的建设者胼手胝足，流血流泪，甚至献出生命，一点一滴造就的。他们的牺牲和奉献，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尊敬。三线建设中，三线建设者的奋斗与奉献中，逐渐形成了“艰苦创业、无私奉献、团结协作、勇于创新”的三线精神。三线精神在实践中孕育而生，成为三线建设里鼓舞人心的力量。在新时代，又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价值，在现实中仍然起着激励人、教育人、团结人、鼓舞人的作用。

（作者简介：周云，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；刘少萍，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）



牙雕作品“五福贺寿”。广州市大新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（原大新象牙厂）供图

旧日风情：民国报刊中的牙雕

传承，已将层数突破到57层。

民国时期牙雕制品不仅出口海外，也有一定内销市场，比如象牙筷、象牙玩具等零碎小件多销于长江一带。这些产品的保养方法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紧密关联，报纸也时有介绍。1919年4月18日的《晨报》中的家庭生活常识栏目介绍了使象牙器物复新的方法，称：“西洋食器之中象牙柄刀与本国之象牙簪，如染油渍，可先于硫酸中和水少许，浸象牙其中，或以漂白粉与盐素水化合，浸若干时取出，日中晒干，又入肥皂水浸洗再晒，便能纯白。”

说到当时与人们一日三餐相关的象牙筷，报纸上还记录过一则趣闻。象牙及其制品较为贵重，通常来说难以进入穷苦人家，但在特定的年代也曾出现过意想不到的反转。1942年8月14日南京《时报》发表有《象牙筷配穷人家》一文。文中以象牙筷为素材，讽刺当时由战争带来的物价飞涨、贫富逆转的社会乱象。原本种田的乡下人家庭贫穷，若家中有一副象牙筷，会为了讨得起它别的东西都换得更高贵，于是若有了一副象牙筷就会容易把家当腾空了，因此象牙筷只适合乡绅人家。谁想到战后生活却一反常态，原本财大气粗的乡绅人家收入减少，甚至连日常吃

饭都变得艰难，没有好菜好饭吃，于是象牙筷反而更加不相衬了。反观乡下，农产品比战前涨到近百倍，原本的贫穷农家庭因此暴富了起来，每天大鱼大肉，丢了毛竹筷，改用象牙筷了。这则新闻观察细致入微，从并不起眼的象牙筷入手，反映社会贫富的颠倒，让区区一双象牙筷成为了战后物价异常的放大器。

当时的象牙筷，报纸上还记录过一则趣闻。象牙及其制品较为贵重，通常来说难以进入穷苦人家，但在特定的年代也曾出现过意想不到的反转。1942年8月14日南京《时报》发表有《象牙筷配穷人家》一文。文中以象牙筷为素材，讽刺当时由战争带来的物价飞涨、贫富逆转的社会乱象。原本种田的乡下人家庭贫穷，若家中有一副象牙筷，会为了讨得起它别的东西都换得更高贵，于是若有了一副象牙筷就会容易把家当腾空了，因此象牙筷只适合乡绅人家。谁想到战后生活却一反常态，原本财大气粗的乡绅人家收入减少，甚至连日常吃

